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随着苏联对外战略从“大国合作”到“阵营对抗”的转变，苏联对东欧政策亦做出相应调整，体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发展道路上出现了由“新型议会制共和国”到“全面移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变化。

战后初期 苏联对东欧政策

——捷克斯洛伐克个案

(1945 — 1953)

COLD WAR



吕雪峰 / 著



世界出版 出版社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

本书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
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
目（10YJC770063）资助

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

——捷克斯洛伐克个案

（1945—1953）

吕雪峰◎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捷克斯洛伐克个案：1945—1953 /
吕雪峰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012-5607-5

I. ①战… II. ①吕… III. ①苏联对外政策—研究—1945—1953
IV. ①D85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61835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特邀编辑 狄安略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书 名 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捷克斯洛伐克个案 (1945—1953)
Zhanhou Chuqi Sulian Dui Dongou Zhengce—Jiekexiluofake Gean (1945—1953)

作 者 吕雪峰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 × 1092毫米 1/16 17印张

字 数 270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1月第一版 2018年1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607-5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李丹慧

编 委（以姓氏拼音排序）

白建才	蔡佳禾	陈 兼	崔 丕	戴超武
邓 峰	黄民兴	李丹慧	刘晓原	罗养毅
牛大勇	牛 军	沈志华	王晓德	夏亚峰
徐 蓝	徐思彦	杨奎松	于 群	余伟民
翟 强	张小明	张曙光	章百家	赵学功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

总序

在历史研究中，冷战国际史研究不仅着眼于国际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而且还在这一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故而，就此意义上说，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于国际关系史范畴的新的研究领域。

冷战国际史区别于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它的国际性，它是一个国际史。所谓“国际史”，其含义有两个层面，其一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其二则在于，冷战首先表现为以意识形态、制度为分野的分庭抗礼，不同制度的国家卷入其中，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国际斗争，由此引发美苏集团对各地区、民族或国家事务的卷入，除阵营国家外，处于中间地带的各民族国家多分别依附于一方，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两极国际格局的演变已经融为一体。这种历史现象的内伸与外延，已不是一般的国际关系史所能囊括的了。

1991年，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两德统一为标志，冷战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即之，以俄国档案的解密为契机，一系列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档案也纷纷见诸于世，加上原有的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定期公开的档案，学者们可以通过大量的一手材料更加真实地描述和解释冷战时期的历史。所有这些构成了冷战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异军突起的时代机遇。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于1991年率先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随之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或团队。此后, “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 并被国际学界广为接受。

当20世纪中叶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相互对抗成为过去后, 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也即逐渐拉开, 各国冷战史学者得以在摆脱冷战环境及其思维定式束缚的条件下, 对冷战的概念、内涵和外延, 冷战的起源, 冷战思维对各国决策层的影响, 大国关系对国际政治力量改组的影响, 小国在冷战格局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不同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及其对两极格局的影响, 美苏之间冲突、遏制、对抗和缓和的交替过程, 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冷战因素, 冷战框架和冷战思维对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影响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 进行比较客观的再思考。由此, 国际学术界掀起了对冷战历史研究的新的热潮, 参与学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课题的种类和范围, 以及档案文献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 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年的研究状态。这种新的国际学术潮流, 被国际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称为“新冷战史”(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近些年来, 冷战国际史的新研究日渐深入, 其主要学术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众多冷战史研究群构成了国际学者队伍。在美国和西欧,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位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冷战研究项目、以瑞士联邦技术学院安全研究中心为依托的合作安全平行历史项目(The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等, 是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 此外还有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冷战史研究中心, 法国的“欧洲认同、国际关系和欧洲文明”研究所等冷战研究机构。而中东欧各国也几乎都建立了冷战史研究机构, 除俄罗斯科学院冷战史研究中心外, 经常在国际学界露面的是匈牙利冷战史研究中心和保加利亚冷战研究组。在亚洲, 比较活跃的有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 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韩国参与冷战史研究的

主要是韩战研究会和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近年也成立了冷战研究中心，侧重于冷战在东南亚的历史研究。香港大学历史系的美国研究中心经常与各国冷战中心合作举办国际会议，是亚洲冷战研究的主力之一。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群，“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也有冷战史研究小组。印度学者最近也开始加入冷战史的研究队伍。

2. 档案开放、收集的国际化与多国档案的综合利用。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以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构成学术论著的叙述主体，不仅如此，这项研究还强调综合利用双边档案或多国档案从事学术考察。以往的冷战史研究，依靠的主要是美国档案，故形成“美国中心论”——冷战史实际上是美国外交史——在所难免。目前，各国档案的开放、收集、整理、翻译及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冷战史研究领域首先关注的事情。正是这种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化趋势，从根本上突破了“美国中心主义”倾向，使冷战史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史研究。

3. 研究者学术关怀的重点集中在历史事实的重建。冷战国际史之所以被称为“新冷战史”或“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者持有相同的、统一的观点，更不在于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而是恰恰相反，学者之间在很多观念、概念、定义以及对史料的解读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的释义和看法。就学术关怀而言，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首先和重点在于重新描述历史过程，重新构建历史事实。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现代史在基本史实的认定方面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档案文献的阙如，冷战双方的研究者无法看到或并不关注铁幕的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学者眼中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甚至是扭曲或被歪曲的。如今，随着对峙双方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公布，以及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弱化，冷战历史的原貌开始浮出水面。冷战史演进的全过程进入重建阶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国学者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4. 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日益加强。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档案大规模开放的现实促成的，也是其研究领域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冷战史研究领域的重大专题研讨会，需要多国学者利用多国档案共同参与讨论，如此才能更有效地辨明事实

真相，总结历史教训。

5. 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目前，在持续关注冷战起源、苏联与冷战的关系、中美和中苏关系、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诸多热点问题的同时，冷战史学者也开始走出大国关系史研究的光环，注重考察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的互动关系。从战后基本同步、并列延伸的冷战和殖民主义瓦解的进程来看，冷战的发展实际超出了东西方对抗的范畴，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多元化特征的历史过程。两个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地区争斗的日益激烈，使得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的冷战对峙和民族独立运动这两大历史脉络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冷战的规模由此拓展至全球。这期间，第三世界的角色不容忽视。只有进一步考察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中的地位和影响，才能使人们更加深刻而全面地了解冷战年代世界格局的内涵，以及在这一总体格局中各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此外，冷战国际史研究还进一步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范畴，把观察的视野转向经济、文化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冷战”、“文化冷战”、“宣传战—心理战”等研究逐渐兴起，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发展趋向。冷战结束以来，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社会等各类专门史，都不可能摆脱开冷战这个核心；与此相应，研究冷战史，研究国际格局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也必须考察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社会等问题。因为正是这些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融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冷战时代本身，也只有运用多维视角，才能完全展现出冷战史作为一部国际史的价值和魅力。就方法论言之，一些学者正尝试着在合理的新历史证据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冷战国际史概念、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而这种做法本来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重新建构历史活动之中的应有之义。

作为冷战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角色和作用 is 冷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冷战进程交织在一起。以此，中国学者在冷战史新研究兴起之初就参与到了这一学术潮流中。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正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新中国对外政策、台海危机、越南战争等一系列冷战史重大课题的研究中，许多中国学者的观点及其所依据的史料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

影响，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具备了与国际一流学者对话的能力。与其他学科稍有不同的是，中国的冷战史学科一开始就是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同步的，目前冷战史学界的新趋势也是贯穿在中国冷战史学科发展之中的。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作为中国学术界新兴学科的地位也已经确立起来。

不过，中国学者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仍然存在着某些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其一，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仍然是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大宗产品”，从事其他方面研究的学者比例过低。其二，多国多边档案的互证对比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三，偏重政治、外交和军事史研究，对社会、科学、经济和文化方面冷战的研究尚嫌重视不够。在中国日益崛起的今天，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还须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学者们的视野应该不断“扩张”，探索也应该“面面俱到”。毕竟冷战的历史极其丰富和鲜活，队伍庞大的中国的研究者应当尽可能均衡地关怀和揭示冷战史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新冷战”（New Cold War）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国之间围绕利益和权力展开的对抗，国际政治中出现的对峙和遏制，似乎重演着冷战年代的是是非非。面对新产生的“世界是否会进入新冷战时代”、“目前国际紧张状态中有哪些因素来自于冷战年代”、“国际局势今后将如何发展和演变”等问题，人们只有通过思考过去的经验教训，才能做出合乎逻辑的解答。由于当代世界的结构性因素和重大国际问题的渊源都与冷战时期密切相关，所以，冷战史研究可以为理解和把握后冷战时期的历史运动规律、应对及管理现实的国际危机，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和战略性评估。这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加强冷战国际史研究，并在学科建设方面将这一研究提高到应有地位的现实意义所在。

有鉴于此，为了推动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继续拓展和深入，促进中国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以及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选择对外方针提供政策咨询，我们着手编辑并出版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这套丛书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既有中国学者的最新专题研究成果，也有国外学者的冷战史研究新作，以及口述历史著作。该套丛书将持续编辑出版下去，以期集中反映

中外学者冷战史研究的面貌，拓宽中国冷战史学者的思路，开掘冷战史研究的新材料。

我们相信，经过中国学者的努力，中国的冷战国际史学科，必将不断走向成熟；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也必将以其客观、严谨、厚重、创新的学术品质，跻身于世界史林。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2年6月

前言

选题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结束阶段，斯大林和丘吉尔就划分欧洲势力范围达成了“百分比协定”，根据该协定，苏联在一系列东南欧国家拥有决定权。莫斯科把东欧^①视作自己的核心利益，地区事务不容染指。欧洲冷战格局形成史表明，“东欧失控”局面的出现成为苏联对外放弃“大国合作”，转而推行“阵营对抗”战略的首要原因，其结果导致苏联对东欧政策做出调整，体现在东欧各国发展道路出现了由“通往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到“全盘苏化”的转变。

战后初期东欧社会发展道路转型与苏联对外战略的变化存在互动关系，地区历史进程完整地展现了苏联欧洲冷战战略转变进而对东欧政策做出调整的原因、过程。本研究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个案来探讨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转变过程基于如下考虑：

第一，从被解放东欧国家的类型来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作为战败国进入战后世界的，苏联对这些国家实施占领，社会发展道路转型由苏联军管政府移交政权的途径轻易实现；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的势力范围）主要是依靠自身力量获得解放的国家，共产党在领导群众从事反法西斯斗争的过程中获得了崇高威望，实现社会发展道路转型任务一蹴而就；民主德国是一个特例，一些学者将社会主

^① “东欧”这一术语具有地缘属性和政治属性。近年来国外一些学者指出战后欧洲进入苏联集团的国家并不全在东欧，于是开始使用“中东欧”这一术语，但这一表述方式同样存在问题，显然没有将部分南欧国家包括在内。基于习惯，本研究仍使用“东欧”这一表述方式，专指战后加入苏联集团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

义的民主德国的出现是克里姆林宫“意外的孩子”，需单独进行研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是二战的战胜国，但二者在苏联的战后欧洲安排中所处地位不同。俄波历史积怨深重，波兰被莫斯科看作是德国进攻苏联的平台，而捷克斯洛伐克被看作是在中欧和东南欧保持苏联影响的传导者。

第二，根据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上”，这样，已完成工业现代化任务的捷克斯洛伐克被看作是移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的最佳实践场所。二战前捷克斯洛伐克已是工业现代化国家，城市化水平高，农业和乡村的比重小。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在二战以前捷克斯洛伐克就有了若干公有制企业，民众对政府干预经济没有特别的反感。工人人数众多，组织程度高。而其他东欧国家（民主德国除外）仍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工人人数和组织程度无法同捷克斯洛伐克相比。

第三，捷克斯洛伐克具有深厚的议会民主制传统。从一战后立国到希特勒德国入侵前，捷克斯洛伐克奠基人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努力将捷克斯洛伐克建设成为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国家，即使在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各国共产党遭到镇压被迫转入地下的条件下，捷共仍为作为合法政党存在。“慕尼黑事件”发生后贝奈斯出走国外，在流亡期间他对国家未来命运问题进行了反复思考，提出了融合苏维埃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走第三条道路和让捷克斯洛伐克充当“东西方桥梁”的思想，这一思想对斯大林在被解放欧洲国家推行联合政府政策的最终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苏联努力把捷克斯洛伐克打造成为新型民主制的样板国家。

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战后初期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发展道路完整地展现了苏联对东欧政策的形成、实施过程及其变化，因而，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个案来探讨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最具价值。

研究回顾

关于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与地区历史进程的关系，学者们通常把东欧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对象来著述和编撰史料，个案研究相对较少，因而，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内容断续分布在作品的各章节中。

冷战时期的学术作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学者的著作，均有

敌对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史料不足的缺点。社会主义阵营学者在著述时强调苏军在解放东南欧人民过程中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战后对东欧各国粮食、技术援助和道义支持，以及帮助东欧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意义。^①这种情形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一些学者开始注重实证研究，利用能够接触到的档案文件还原史实，对过去的历史事件做出批判性思考。代表性作品如波普的《1941—1947年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这本研究著作侧重描述历史事件的真实场景，行文间很少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论，反映出苏联解体前后苏联史学的过渡性特征。^②西方学者重点考察了1948年“二月事件”史，他们严厉谴责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战后国家发展中的不轨行为，认定这一事件是苏联指使的，但受史料的限制，他们只能进行主观上的推测，而拿不出可资证明的证据。^③

冷战结束后，地区冷战史研究热潮兴起。在捷克，一些学者开始利

① [苏] 法尔比洛夫：《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与发展》，上海：正风出版社，1950年；Волков В. К., Сиполс В. Я., СССР и страны народ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дружбы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1944-1949 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5; Волков В. Л., Защита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интересов народо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год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а путях нерушимой дружбы,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Мурашко Г. П.,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основных средств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Мельникова И. Н., Недорезов А. И., Прасолов С. И. (ред.),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том. 3,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0; Шедивый К., Коржфкова 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1945-1960, Москва, 1960; Недорезов А. И., Недорезов А.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1938-1945, Москва, 1961; Индржих Веселый, Хроника февральских дней 1948 года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② Поп И. 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1-1947 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0.

③ Glorney Bolton, *Czech Tragedy*, London: Watts, 1955; Josef Korbel, *The Communist Subversion of Czechoslovakia, 1938-1948: The Failure of Co-Exist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Paul E. Zinner, *Communist Strategy and Tactics in Czechoslovakia, 1918-48*,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3; [捷] 爱德华·塔波尔斯基的著作：《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1948—1960年》，何瑞丰、徐式谷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Zdeněk Suda, *Zealots and Rebels: A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zechoslovak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c1980; Edward Taborsky, *President Edvard Beneš: between East and West, 1938-1948*,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c1981; Josef Kalvoda, *Czechoslovakia's Role in Soviet Strategy*, Wash. D.C.: Univ. Press of America, 1981; Tad Szuic, *Czechoslovakia since World War*, The Viking Pr., New York, 1971.

用本国最新披露的档案资料从事本国及地区史研究。受语种限制，我们只能阅读部分被译成俄文的史学作品。不过，俄国学者马丽娜为我们系统地梳理了冷战结束后捷克学术界档案出版与研究情况，对捷克现代史研究所两位著名学者卡普兰和甘兹利克的学术作品进行了评析。^①

卡普兰的代表作品是《“二月事件”中的五位领导人》，作者使用捷克档案从事“二月事件”史研究，对“二月事件”期间国内各政治力量进行了对比分析，关注对内务部和国家安全机关在“二月事件”中作用的研究。虽然他承认二月冲突存在内外双重因素，但他认为，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恰恰在于共产党致力于夺取政权。卡普兰得出结论：二月政府危机不仅是政治体制危机，也是人民民主制度的危机。民族阵线联盟的解体——制度的政治基础——不仅是制度基础的丧失，也是国家政变的决定性条件，即制度更替。

甘兹利克的代表作品是《1948年2月——不平等斗争的结果，夺权的秘密》。同卡普兰一样，甘兹利克也非常注重国家强力机关在“二月事件”中的作用的研究。指出，共产党公开地、广泛地使用他们控制的内务部和国家安全机关开展活动，而各民主政党处于不利地位，这是政府危机公开爆发的原因之一。作者认为，从1948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就使用了两种策略开展夺权斗争：第一种是公开的方式，通过合法的手段，利用共产党在政府、议会和国家各部门中的势力为夺权创造条件；第二种是在各种情况下都要夺权的综合措施，这些措施都是针对反对派的，通过秘密方式进行。

通过马丽娜对捷克两位学者作品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捷克学者对“二月事件”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本国内部政治斗争的角度去分析，尽管他们不否定外部因素的作用，但他们认为“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恰恰在于共产党致力于夺取政权”。捷克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要想完整地还原那一历史时期真实画面仅仅依靠捷克档案进行单边研究是不够的。

俄罗斯科学院斯拉夫与巴尔干研究所的学者们利用本国解密的关于东欧问题的档案资料撰写了《人民民主：神话还是现实？东欧的社会政治进程（1944—1948年）》《莫斯科与东欧：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建立

^① 关于捷克史学研究现状的介绍详见 *Марина В. В.,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й “февраль” 1948 г.,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виде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 10, с.150-155.*

(1949—1953年)》^① 两部著作，展现了俄国学术界关于东欧问题研究的最新研究水平。

《人民民主：神话还是现实？东欧的社会政治进程（1944—1948年）》一书主要关注了如下问题：战争与和平之间东欧各国社会力量的构成及其思想和政治倾向；战后政治舞台上不同政党和集团提出的社会发展观念；围绕战后发展观念展开的政治斗争及影响这一结果的因素；社会基础和居民情绪激进；1947—1948年东欧工人运动情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政治转折。该书的创作集体认为，战后东欧是左倾激进主义高涨的时期，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他们致力于夺取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因素莫非可以看作是某种持续的力量，只是在某些方面符合某一政治力量 and 他们的领导人思想时才起作用。”^②

《莫斯科与东欧：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建立（1949—1953年）》一书主要关注了如下问题：东欧各国政治体制的建立过程；干部情况和党政官名录；新闻封锁；镇压和清洗；苏联的顾问制度及其在建立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等。该书得出结论：“地区的历史经验表明，外部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受内部因素的制约，在内部条件、情况变换和冲突交织的过程中，外部因素毕竟是第二位的。”^③

冷战结束后，国内能够使用一手档案文献从事苏东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并不多，沈志华、张盛发、李兴教授是这一领域的先驱者。沈志华教授关注了苏南冲突研究，代表作品是《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张盛发教授和李兴教授的代表作分别为《斯大林与冷战》

①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Мурашко Г. П., Носкова А. Ф.,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48 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Мурашко Г. П., Носкова А. Ф.,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типа, 1949-1953: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②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Мурашко Г. П., Носкова А. Ф.,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48 гг., с. 6.

③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Мурашко Г. П., Носкова А. Ф., Покивайлова Т. А.,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типа, 1949-1953: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 261-263.

和《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冷战时期的苏联与东欧关系研究》。^①我们看到，沈志华和李兴两位学者侧重于冷战与同盟关系的研究，而张盛发教授则从宏观层面探讨了苏联与冷战起源的关系，苏联的冷战基础、冷战政策等内容。至于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与地区历史进程的关系这个课题，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

研究思路

比较捷克和俄罗斯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在史料方面，两国学者都使用了本国最新披露的档案资料从事研究，对那一历史时期的许多史实进行了梳理和辨正；在研究视角方面：无论捷克学者，还是俄罗斯学者，都把笔墨重点放在地区政治史研究上，尽管承认捷克社会发展道路中外部因素存在作用，但把它归为第二位。

为弥补现有研究之不足，笔者尝试从两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在档案解读方法上有所突破。目前已披露出来的关于东欧问题的苏联档案文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单向性，即文件主要是苏联驻东欧各国大使、参赞、《真理报》记者等发回莫斯科的关于东欧各国社会事件进程的情况报告，同东欧各国领导人的会谈记录，及苏联外交官对东欧各国形势的分析报告，而莫斯科给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训导”和“指令”性文件几乎难以见到，不难理解，莫斯科此举旨在避免西方和东欧各国资产阶级政党指责苏联干涉东欧各国的内部事务造成口实，即使在必要的条件下发送给共产党领导人的电报一般附有“阅后烧毁”的字样。正因为找不到苏联干涉东欧各国内部事务的文件证据，一些学者得出了外部因素居于次要地位的结论。那么，莫斯科是以怎样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图传达给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也就是怎样看待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输出机制问题？在笔者看来，莫斯科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联络渠道大概有三种途径：一是通过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后改为国际部）同各国共产党的情报往来，通常是由莫斯科驻东欧各国外交官或情报人

^① 沈志华：《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李兴：《从全面结盟到分道扬镳：冷战时期的苏联与东欧关系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

员口头传达，这类文件目前已披露出来的数量非常有限^①；二是斯大林同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按照当时的惯例，此种性质的会谈不做记录；三是通过召开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传达莫斯科的指示。这样，要想弄清楚苏联对东欧政策输出过程，一方面要关注共产党领导人回国后对莫斯科指示的传达情况、所采取的行动，结合口述史料进行合理推论；另一方面，注重对共产党情报局文献的使用。1998年出版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记录，1947/1948/1949》^②收录了大量联共（布）关于东欧及西欧共产党所犯错误的分析材料，筹备会议的过程及会议期间会议负责人同斯大林的电报往来等，利用这批文件有助于我们考察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输出机制，从而更好地理解苏联对东欧政策与地区历史进程的关系。

第二，利用“四维分析模式”辩证把握“本土革命与外部因素”^③之间的关系，论证地处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发展道路问题上没有独立选择性。

二战结束前后，斯大林从大国合作战略出发在被解放欧洲国家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要求共产党加入政府，但在东欧要求共产党在政府中居于主导地位，走“民族式社会主义道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了联合政府。捷共取得了1946年议会选举的胜利，得到联合社会民主党组建政府的权力。哥特瓦尔德政府颁布了《重建纲领》，经过战后重建，捷克斯洛伐克具有了人民民主制度的特征：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对苏友好。民族民主革命完成后，得到苏联支持的捷共同得到西方支持的

^① 2011年俄罗斯高级学者彼德罗夫出版了《按照斯大林的方案：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在中东欧苏维化过程中的作用》一书，由于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的档案文件禁止对外学者开放，因而作者在书中披露的文件就更为珍贵。Петров Н. В., Посценарию Сталина. Роль органов НКВД-МГБ СССР в советизации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1945-1953 г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11.

^② Новиченко И. Ю. (отв.ре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8.

^③ 挪威学者文安立在其著作《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提出了从国际和本土两层面辩证把握“冷战与第三世界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将这种研究范式称之为“四维的分析模式”，余伟民教授对该研究范式做了进一步解读，详见余伟民：《国际斗争与本土革命：冷战逻辑的解读》，《华东师大学报》2005年第2期。